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追尋一個忽隱忽現的身影

顧孟餘(1889–1972)曾經在中國近代學界、政壇叱吒風雲，不過在死後，卻逐漸地為人們所淡忘。現在無論在中國大陸或台灣，很少人聽過他的名字，或知道他的生平事蹟。即使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對他的瞭解也很有限。本書嘗試追索他的一生，並瞭解他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他生於清末，早年曾進私塾，然並未參加科舉考試，而是受到新思潮的影響，接受了新式教育，又考取官費，赴德國留學，成為一位具有專業訓練的新知識分子。返國後，顧擔任北京大學教授、教務長，後因蔡元培(1868–1940)、李石曾(1881–1973)、李大釗(1889–1927)等人之介紹，於1924年加入國民黨，輔佐汪兆銘，成為汪派、國民黨左派與改組派中的骨幹人物，為汪出謀獻策。¹顧孟餘有汪

1 「汪派」是指支持汪兆銘的一群人，1925年7月1日汪出任國民政府委員會常務委員與主席之後，報紙上即有「汪派」、「反汪派」的說法。如在1925年7月19日的《申報》上「倘汪派佔勝，汪氏入政，則反汪派必將失敗」。木庵，〈粵政局最近之形勢〉，《申報》，1925年7月19日，第10版。王克文認為「汪派」之雛形見於1926年「迎汪運動」，後來這些人集中於武漢政府，接受汪之領導，亦佩服汪氏之見解與能力。從寧漢分裂到合作期間，「汪派」才成形。1927年底，反「特別委員會」時，仍跟著汪氏西走武漢、南下廣州的原武漢領袖，如陳公

的「頭號軍師」、「諸葛亮」或「汪之靈魂」的稱號，與陳公博並稱汪身邊的「左膀右臂」，曾參與聯俄容共、武漢分共、改組派與擴大會議。在國民黨內他們經常與蔣站在敵對位置，蔣中正一生三次「下野」中的前兩次都與這一批反對派有關。²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汪蔣合作，顧擔任鐵道部長（1932–1935），參與國家建設，支持蔣所主導的剿匪抗戰。然而在1938年底汪兆銘自重慶出走、發表「豔電」，建立附日政權後，他不像陳公博、周佛海、褚民誼、梅思平等人那樣跟隨汪，而毅然勸阻反對和談，後投奔蔣中正的抗戰陣營，並獲得蔣的重用。蔣任命他為中央大學校長（1941–1943），並支持他出任行憲後的行政院副院長、考試院長（1948，均未就）。蔣一直稱他為「孟餘同志」或「孟祥先生」，以示尊重，然而即使如此，汪派人物的戳記與政治理念卻深深影響他一生的遭遇，以及日後歷史的地位。1949年國共內戰期間，蔣第三度下野之後，李宗仁曾邀請他組閣，顧以時局太難、兩黨兩不成而婉拒。中共建政後，顧孟餘對國共兩黨均感失望，他與張發奎、張國燾、張君勱、童冠賢、陳克文等人合作，在桂系李宗仁與美國的支持之下，參與香港與日本的「第三勢力」、批判國共兩黨。此一抉擇雖出於政治考量，然與汪派的政治理念實有密切的關係。這一方面是因為汪在出走之前，顧孟餘與陳公博為汪的智囊，規劃汪派的治國藍圖，另一方面在汪所主導的附日政權結束之後，顧則延續早期的主張，貫徹汪派「批蔣反共」之理念，

博、顧孟餘、何香凝、陳樹人等人，可視為「汪派」的核心。此後十年，甚至看到汪氏去世，此一形成於武漢時期之「汪派」，始終是汪氏在國民黨內爭奪領導權的最大資源。王克文，《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台北：國史館，2001），頁119。陳公博則說：最接近汪氏的是他左右的親信，亦即「汪派」，最外圍的是「信奉汪先生的主張」的「左派」，而「改組派」（改組同志會之同志）則介於二者之間。「這三派的分野雖然大方明瞭，內部卻著實有些傾軋的痕跡」。陳公博著，汪瑞炯、李鏗、趙令揚編註，《苦笑錄：陳公博回憶，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六》（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79），頁211。

2 第一次是1927年8月13日，蔣於寧漢分裂時，在桂系與汪兆銘、唐生智等人的逼迫而下野。第二次是1931年12月15日，他在寧粵之爭的過程中，受到胡漢民、孫科、汪兆銘等人之逼迫而下野。

期盼為中國走出另一條路。此一運動失敗之後，他赴美國加州定居，後病逝於台灣。本書以顧孟餘的一生經歷為主軸，討論他的個人際遇與政治抉擇，以彰顯各種歷史機緣使他在引領時代風潮與隨波逐流的夾縫中走了一條曲折的人生道路。

顧孟餘一生雖涉及民國史上許多重大事件，不過他所留下來的資料並不多。誠如論者所言，「在中國現代史上，顧氏……是一個忽隱忽現、忽進忽退的影子。有關顧氏之文獻與史料少而又少。顧氏雖居高位，卻難得出現在公眾之前，就職、離職，既不發表通電，也不公開演說，更從未印行言論集、演講集之類書籍，甚至其本人之墨跡及照片流傳在外者也極罕見。」³在史料之中能找到一些他的著作、墨跡與照片等，也有一些簡短的回憶文章與二手研究。除此之外，相關的材料並不多見，這與顧孟餘「淡薄持身」的性格頗相符合。

1972年顧孟餘在台北過世時，曾由陶希聖(1899–1988)、谷正鼎(1903–1974)、李壽雍(1902–1984)、周德偉(1902–1986)等人共同執筆，寫了一篇〈顧孟餘先生事略〉，簡要地敘述了他一生的事蹟。當時蔣中正尚在世，文中對於他與汪兆銘、國民黨左派、改組派的關係等均含糊帶過，且汪的名字並未出現，只含蓄地說「抗戰既發之後，更堅持民族大義，摒棄奸偽組織，雖相從多年之友亦凜然不可干」；對於顧與蔣的衝突、恩怨、離合，與他參與第三勢力運動時反共、反蔣等事蹟則完全不提。他被描寫為一位畢生忠黨愛國、協助蔣中正反共大業的國民黨員。該文最後，陶、周等人以蓋棺論定之筆法強調顧孟餘「以博學深思之學人，獻身於三民主義國民革命，其言論文章从不曲學阿世，其政治行徑亦和而不同。知之者咸以為其愛國愛黨之真誠不可及，其持身之寧靜高潔尤不可及也。」⁵然究竟如何「不曲學阿世」、「和而不同」，則不得

3 編者，〈關於顧孟餘先生及本社座談會的一些報告〉，《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頁30。

4 陶希聖，〈記顧孟餘先生〉，《傳記文學》，第21卷第2期(台北，1972年8月)，頁29。

5 國史館編，〈顧孟餘先生事略〉，《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台北：國史館，1998)，第17輯，頁564–567。

其詳，其中似乎留下一些伏筆，頗耐人尋味。《中央日報》在顧過世時的報導則說「對孟餘先生民族大義之堅持，出處大節之分明，學術思想之深遠，從政治事之廉能，忠黨愛國而淡於名位，高風亮節，備致欽敬」。其中也同樣地隱蔽了他與汪兆銘及第三勢力運動的關係。⁶在英文的《民國名人傳》之中，有一篇顧孟餘的小傳，寫於顧過世之前（1966年），作者可能曾經訪問過顧。此文寫得較為公允，作者開宗明義即說「顧孟餘（1889-）是德國訓練的經濟學家、北大教授，1920年代加入國民黨。1933年之前他是汪精衛的政治伙伴。1949年後，他參與所謂香港的第三勢力運動。1950年中期赴美國，回歸學術生活」。文中並不避諱他與汪兆銘以及第三勢力運動之關係，也簡單地描述他在美國加州的平淡生活。⁷由此可見1960-1970年代蔣中正統治下的台灣與美國學界在民國史論述上的差異。蔣中正在1975年過世之後，顧孟餘的生平才開始變成一個可以公開討論的課題。1976年在《傳記文學》「每月人物專題座談會：顧孟餘」專號中，梅恕曾（1901-1982）、吳榦（1903-1990）、胡耐安（1899-1977）、凌鴻勛（1894-1981）等人有幾篇回憶文字，⁸不過也沒有觸及顧孟餘和汪及第三勢力的關係。這種情況到台灣解嚴之後方逐漸有所改善。⁹2010年代之後海峽兩岸學術作品中有一、兩篇曾探討他擔任鐵道部長時所引發的彈劾案、¹⁰顧孟餘與第三勢力之關係或簡述其一生

6 〈顧孟餘病逝治喪會決定 喪葬從簡〉，《中央日報》，台北，1972年6月28日，第3版。

7 Howard L. Boorma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1979), Vol. 2, pp. 252-255.

8 參見〈每月人物專題座談會：顧孟餘〉，《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頁6-30。

9 如符滌泉，〈顧孟餘傳〉，《國史擬傳》（台北：國史館，1992年6月），第3輯，頁295-299。此文的主要內容採自上述1972年的〈顧孟餘先生事略〉一文，不過增加了一些顧孟餘與汪兆銘及香港第三勢力的關係。

10 如劉云虹，〈從顧孟餘案看監察院的彈劾制度〉，《民國檔案》，2010年第4期（南京，2010年11月），頁80-85；段智峰，〈蔣汪合作格局下的另一種局面——以1934年顧案為中心〉，《民國檔案》，2011年第1期（南京，2011年2月），頁103-110。盧豔香，〈實際運作中的中政會——以「顧案」為中心〉，收

的作品。¹¹ 外文有關汪兆銘與國民黨左派的著作中則並無像台灣學界那樣的禁忌，1970–1990年代的幾本專書都比較忠實地提到顧的生平與思想以及他與汪兆銘的關係，而特別注重顧孟餘與陳公博作為左派理論家在思想上的差異。¹²

最近十多年以來，因為各種新史料的出現，顧孟餘在歷史上的身影才逐漸浮現。第一類資料是三部由曾與顧孟餘共事者所寫的書，其中有兩本回憶錄、一部日記。第一本書是筆者在序文中所提到2011年出版的周德偉的回憶錄《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該書對蔣所主導「一言堂」之下的國民黨史有所不滿，大力批評擁蔣、抑汪的書寫方式。該書稿在1983年完成之後一直沒有出版，延宕多時，至2011年才問世。此書之中揭露了許多有關顧孟餘的事蹟，在書中周德偉特別突出顧孟餘在汪兆銘身邊所扮演的重要幕僚之角色，以及顧孟餘在「太原約法」之中建構汪派政治理念的貢獻。此書是事後追憶性文字，一方

入《中國國民黨中政會研究，1924–1937》（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6），頁143–157。

- 11 陳正茂、李語寧，〈書4 從政的悲劇——顧孟餘政治活動之探討〉，《台北城市大學學報》，期37（台北，2014年3月），頁247–268。黃克武，〈顧孟餘的政治生涯：從挺汪、擁蔣到支持第三勢力〉，《國史館館刊》，第46期（台北，2015年12月），頁103–168。
- 12 Gerald E. Bunker, *The Peace Conspiracy: Wang Jing-wei and the China War, 1937–194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119, 147; Wai-chor So (蘇維初), *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1924–1931*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山田辰雄，《中国国民党左派の研究》（東京：慶応通信，1980）。山田辰雄教授從國民黨、共產黨的相互作用與觀點異同之比較來看國民黨左派研究之意義。他指出這些政治集團的研究可以從各種政治勢力相互作用之中來理解現代中國。國民黨左派居於蔣中正之國民黨與毛澤東之共產黨的中間路線。它與國共兩黨在大眾政治參與及大眾組織動員上均有異同，此一課題之研究對於理解中國革命之全體有重要的意義。他在該書第五章、第六章提到顧孟餘在武漢國民政府與改組派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並詳細地描述了陳公博與顧孟餘有關國民黨階級基礎的辯論，見頁181、188、208、216–217、219–231。

面有一些具有「偏見」的一家之言，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記憶的錯誤。¹³就顧孟餘研究來說，因顧氏本身的傳記材料比較缺乏，周德偉的記述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線索，讓我們認識到一些他所觀察到的顧孟餘，以及背後複雜的歷史脈絡。

第二部書是2012年陳方正編輯、校訂的《陳克文日記，1937-1952》。¹⁴陳克文過世之後，其子陳方正在家中抽屜內發現此一日記，因而整理出版、公諸於世。此一日記先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正體字版，再由北京的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簡體字版（此一版本改正了許多正體字版中的錯字，在版本上較佳），在海峽兩岸乃至歐美近代史學界廣受注目。陳克文（1898-1986）為廣西岑溪人、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畢業，1923年入黨之後即受廣西籍同鄉甘乃光（1897-1956）的影響而與汪建立密切的關係，也是一位「汪派分子」。¹⁵他曾在廣州與武漢政府時期負責

13 筆者特別感謝王奇生、劉維開教授指出書中的一些錯誤。

14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上、下冊。

15 甘乃光字自明，廣西岑溪人，1922畢業於嶺南大學經濟系，後留校任教；1924年7月任黃埔軍官學校英文秘書兼政治教官，與汪兆銘熟識。1925年汪成為廣州國民政府主席，對甘氏十分器重。他在黨內地位開始崛起。1926年出任國民黨青年部部長、農民部部長，1928年赴芝加哥大學深造。1932年出任國民政府內政部政務次長；此後與汪的關係較為疏遠。1938年4月出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國防最高委員會副秘書長；1947年出任行政院秘書長，1948年出任駐澳大利亞大使，1951年去職，1956年9月30日病逝澳洲。在抗戰時期推動行政院公文型式等的改革。有關甘乃光生平參見陳克文，〈甘乃光先生事略〉，《自由人》，第604期（香港，1956年12月15日），第2版。李樸生，〈憶甘乃光先生〉，《自由人》，第649、650期（香港，1957年5月25日、29日），第2版。至於學界對甘乃光生平與思想，與他在1930年代從事行政改革（行政三聯制）的研究，可參考Morris L. Bian, “Building State Structure: Guomintang Institutional Rationalization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Modern China*, 31:1 (2005), pp. 35-71. Lane J. Harris, “Defining the Nationalist Party Center: The Text and Context of Gan Naiguang’s Outline of Sun Wenism,” *Southeast Review of Asian Studies*, Vol. 34 (2012), pp. 87-113. 林瑾芬，〈抗戰時期行政三聯制的推動與檢討〉（台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5）。

農民部的工作，1930年任職於香港的《南華日報》（汪派所辦的報紙），1932年出任僑務委員會委員與僑民教育處處長，後又返港辦報。他在抗戰初期任行政院參事，擔任汪的貼身秘書（1937–1938）。這一本日記記載了他個人對時代的真實感受，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其從政的心路歷程與時局之變化。此外，陳克文日記中有關國共內戰與1949年前後的記載，提供了有關桂系與汪派的合作，共同推動第三勢力運動的一手史料，可以讓我們對第三勢力的起源、發展與顧孟餘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十分具體的認識。再者，書中的附錄收有陳克文所撰〈國民黨左派三傑：甘乃光與顧孟餘〉（原刊於1975年，是作者為紀念顧孟餘逝世三週年所寫的悼念文字）、〈改組派與回憶錄〉、〈曇花一現的左派〉等文。¹⁶文中從「左派領袖」、改組派「巨頭」的角度介紹了顧氏的生平，「從十三年黨的改組開始，至廿六年對日抗戰發生止，十餘年中，左右兩派的糾紛衝突，此起彼落，或大或小，始終未曾停止過；其間尤以武漢政府的成立，改組派的出現，和擴大會議的召開，這幾件事和顧氏的關係最深」。其次他則強調在1949年之後第三勢力運動中的角色，「大局岌岌不可終日的時候，顧氏竟挺身而出，糾集少數國民黨同志，要把國民黨從危難困厄中挽救起來，後來事雖不行，他愛護國民黨的一片熱心和勇氣，實不可沒」。陳克文也說，在左派領袖中，顧孟餘是「最長壽的一個」，且是唯一的一位「在國土之上壽終正寢的」。¹⁷此外筆者也特別感謝陳方正教授將陳克文與李樸生的百餘封通信交給筆者整理，其中亦揭露1949年之後港台知識分子對顧孟餘的看法。

第三本書是張發奎（1896–1980）將軍的口述歷史，《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張發奎為國軍一代名將，威名卓著。他所統帥的軍隊驍勇善戰，有「鐵軍」之稱，在抗戰時立下許多戰功。本書係張發奎晚年在香港接受哥倫比亞大學學者夏蓮蔭（Julie Lien-ying How）四百

16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329–1370。

17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335–1336。

餘次的訪問，後由夏蓮蔭與她的先生 William Hwa 合作整理完成。1983 年出了英文版 *The Reminiscences of Chang Fa-k'uei (1896–1980) as Told to Julie Lien-ying How (1926–1982)*，¹⁸ 後由鄭義翻譯為中文，並於 2008 年在香港出版。書中第 20 章敘述了 1950–1954 年間他與顧孟餘合作在香港「創建第三勢力的努力」，讓我們對顧氏在 1949 年之後的事蹟有較多的認識。¹⁹

第二類資料是近年來公布的蔣中正日記與年譜等材料，如國史館 2003 年開始印行的《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005 年蔣家後人公布的「蔣中正日記」，以及 2014 年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書中收錄了許多「蔣中正日記」、國史館檔案的內容）等史料。蔣中正研究近年來因新史料的公布而有長足進展。就顧孟餘研究來說，顧與蔣關係密切，蔣氏史料（特別重要的是日記）的記載讓我們得以認識顧與蔣的互動，以及蔣對他的觀感、印象，和他對汪派分子與其他反對者的處置方式。蔣的視野可以幫助我們解釋民國史的許多關鍵轉折是如何產生的，此一批史料無疑地是民國史研究的一個寶庫。

第三類資料是政府機構的檔案。在本書中我運用較多的是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的外交檔案與個人檔案（主要是朱家驊檔與王世杰檔）、國史館的「蔣中正總統文物」、「汪兆銘史料」與「國民政府檔案」、「閻錫山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的材料，此外我也用了中國大陸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教育部檔）、南京大學檔案館與重慶市檔案館的材料等。這些檔案保留了官方記載之中顧氏活動之痕跡。其中比較重要的是 2005 年由法務部調查局轉移至國史館的「汪兆銘史料」（起迄時間為 1923 至 1944 年），收有汪兆銘與汪派人物相關之函電，如顧孟餘與汪兆銘之間的往來函電、汪與蔣之間的往來函電，以及汪出走之後蔣動員各方力量規勸

18 Fa-k'uei Chang, *The Reminiscences of Chang Fa-k'uei (1896–1980) as Told to Julie Lien-ying How (1926–1982)* (New York: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1970–1983).

19 張發奎口述，鄭義譯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

汪的函電等，是十分珍貴的一手材料。另一部分則是「蔣中正總統文物」、「國民政府檔案」、外交部檔案等，保留了許多1949年之後情治單位、外交部門對於第三勢力活動的報導，可以幫助我們認識美蘇冷戰格局之下顧孟餘、張發奎等人的動向，及其接受美國補助的情形。

第四類資料是清末民國的書籍、期刊與報紙數據庫。其中較重要的是「民國時期文獻總庫：圖書庫」、「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1-11輯」、「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係文獻數據平台」、「《申報》資料庫」、「《大公報》資料庫」、「《中央日報》資料庫」，以及中研院近史所開發的「報刊資料檢索系統」(收錄之報刊如《福爾摩斯報》、《社會日報》、《晶報》)、香港公共圖書館的「舊報紙資料庫」(收錄了《香港工商日報》等14份中英報紙，可檢索)、日本報紙資料庫(收錄《朝日新聞》、《讀賣新聞》)等。這些報刊數位資料庫讓筆者很容易地掌握各種媒體中顧孟餘所發表的言論、著作，以及報章中與顧孟餘相關之報導等，而能從零碎的資訊中拼湊出一幅比較完整的歷史圖像。報紙資料庫的優點是在事件的時間上較為精準，但是有些報紙的報導，尤其是一些小報，其內容不盡可信，需要加以甄別、判斷。雖然如此，報紙報導還是提供許多重要的訊息，讓我們能掌握顧孟餘的活動與社會觀感。我深刻地感覺到如果不是數位資料庫的發展，這些被壓抑，或隱藏在歷史邊緣的一些人物很難再次活靈活現地重登歷史舞台。科技的進步也促成我們對歷史霸權話語的挑戰。

總之，上述幾種材料的出現讓我們可以追索這樣一位謎樣的政治人物。本書以下各章將依照時序先後敘述顧孟餘的一生，探討他的早年經歷、在北京大學教書與擔任教務長的情況，他如何入黨從政，又如何在國共鬥爭與中日交戰的背景與汪兆銘、蔣中正互動，以及1949年之後參與第三勢力的經緯等。顧氏一生的經歷曲折動人，他所參與的諸多活動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國民黨高層的派系鬥爭與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變化。

為了瞭解顧孟餘一生的經歷，在具體地描述顧氏生平之前，我嘗試從「主義時代」的來臨、汪蔣在政壇的崛起，以及在1920年代國民黨環繞著「聯俄容共」所發生的變化等三個方面，來勾勒顧氏所處的時代環境與背景。